

《近思录》在朝鲜李朝在接受与传播^{*}

曹 洁 程水龙

内容摘要:程朱理学对朝鲜李氏王朝主流思想意识、文化产生了积极影响。作为程朱理学思想重要载体之一的《近思录》，得到了李朝社会的景慕，他们对中国《近思录》系列文献的内容、编纂理念等进行接受，新生出大量《近思录》相关文献。其新创的文本有一种兼容并蓄的思想，由开始的完整接受，发展到以中国《近思录》文献为主体，进而创建出以本民族儒家或朱子学家思想内容为主体的本邦读本。同时又予以批判性接受，衍生出朱子学在异域的新体态。李朝本土化的《近思录》系列文献，促进了朱子学在李朝的大发展，在中朝文化关系史中已成为一道靓丽彩虹，至今熠熠生辉。

关键词:《近思录》 朝鲜李朝 传播

理学自十一世纪以后主导中国的思想体系，对朝鲜半岛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具有重要影响。作为程朱理学经典读本的《近思录》，是南宋淳熙二年（1175）朱熹、吕祖谦编纂^①，在中国南宋及后世各朝均受尊宠，不断有学者进行注解、续编、仿编，形成了中国“《近思录》系列文献”，国内现存近两百种。它们作为程朱理学思想的重要载体，曾长期持续不断地影响着东亚儒学文化圈。

朝鲜半岛自古以来深受中国思想文化影响。中国元明之际，正值理学盛行，而此时刚刚建立的朝鲜李氏王朝（1392-1910）主流思想意识、文化也深受程朱之学的积极影响。李氏朝鲜建立后，汲取了高丽末年佛学乱政的教训，王室实行儒家王道政治，将程朱理学立为官学，在朝鲜半岛逐渐形成全面接受程

^{*}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“朱子《近思录》东亚版本研究”（项目编号：15BZX041）阶段性研究成果。

^①朱熹《近思录前引》云：“凡学者所以求端用力，处己治人之要，与夫所以辨异端、观圣贤之大略，皆粗见其梗概。”见朱熹、吕祖谦辑，叶采集解《近思录》，元刻本卷首。

朱理学思想的局面。作为朱子学承传载体之一,《近思录》在朝鲜也倍受推崇,被提升到显要的理学经典地位,成为进入圣学的津梁。例如,高丽恭愍王十九年(1370)李鲁叔在重刻叶采《近思录集解》时,就认为“是书诸儒极论学问思辨之功,具众理而圣学终始备矣……其于歪门造道之径,升堂之阶不外乎是”^①。李朝吴熙常在续编《近思录》时强调:“窃惟子朱子《近思》一书,即四书之津筏也,大而天人性命之原,细而日用躬行之实,包涵该括,开卷灿然,其所以继往开来者,可谓至深至切矣。”^②

一、李朝社会接受《近思录》中国注本、续编本的特色

朝鲜半岛与中国地缘相亲,唇齿相依,文化联系历来密切。在朝鲜李朝六百年《近思录》系列文献接受与传播的历史过程中,李朝先从接受《近思录》原文开始,随着其学者与中国理学家交往的加深,中国注本、续编本不断出现,朝鲜社会也相应地在本土进行注释、仿编,整理新生出大量本邦《近思录》系列文献,其中经笔者初步实地调查过目的不少于80种。若据韩国宋熹准《近思录注解丛编》^③,李朝人注释、仿编的有关《近思录》整理本则不少于84种。具体而言,这些现存李朝《近思录》相关文献在受容过程中一般呈现如下特色:

1. 李朝社会高度肯定《近思录》所蕴藏的理学思想体系。

众所周知,圣人之道与圣人之书,往往合而为一,彼此融通。圣贤思想主要依附于圣贤者传道授业和其言论著述。后学欲学为贤圣,便要认清历史上儒学圣贤统绪,通过读书知晓圣人之道,发明、传述圣学。《近思录》是理学集大成者朱熹与婺学代表吕祖谦共编的一部哲学选辑,集中体现了北宋四子语录精华。它既总括濂、洛、关、闽之学,又展现出程朱理学“简明精巧的理学体系”,是后世求学理学者的人道之阶。

正因为它“切于人伦道学”,在社会教化上有“裨于性情心术之正”,故传布朝鲜半岛后很快得到朝鲜儒学者的首肯,李朝初年金宗瑞说:“是书所载,皆正心修身之要。”李仁敏说:“是书诸儒极论学问思辨之功,具众理而圣学始终备矣。”可以说,不读《近思录》则难以“穷理尽性以至于命”。由于李朝前期是“望道唯凭性理书”的时代,以研究朱子学为中心的性理学派最具影响力,社会上下景慕中华,促成了朱子学的兴盛,因而《近思录》自然成为受李朝社会欢迎的读物。

更有甚者,将《近思录》与四书同等看待,像经一样予以尊崇,如李朝名臣

①[高丽]李鲁叔《近思录》跋文,载于朱熹、吕祖谦辑,叶采集解《近思录》,高丽朝恭愍王十九年星山李氏刊本。

②[朝鲜]吴熙常《续近思录序》,载于[朝鲜]韩梦麟编《续近思录》,李朝纯祖十九年木活字本。

③[韩]宋熹准《近思录注解丛编》,学民文化社1999年影印本。

洪启禧说：“余谓《小学》、《近思录》当与四子通作六书”^①，因而重刻这本可与儒家经书相媲美的《近思录》，将其作为“四子之阶梯，初学之关钥”^②。至于《近思录》在传播程朱理学的历史进程中所拥有的价值，束景南先生说：“在朱熹以后直到近代，程朱理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《近思录》的注释刊刻流布得到广泛传播的，宋、明、清后儒们也多以《近思录》为‘阶梯’，从《近思录》切入到对程朱理学的认识与接受，因而一部《近思录》的注释传刻流布史，也就是一部宋明到近代的理学接受史。”^③尽管束先生是就国内而言，而历史上的李朝对《近思录》内容的接受也是如此。即使李朝自身再造的《近思录》相关文献，语录文字与原《近思录》不尽相同，可是其基本内核与宋明理学并无明显悖理之处，传扬的依然是近思践履、修治成圣的思想，求学者由此可便捷地进入程朱之学的殿堂。

2.李朝学者将朱、吕的编集动机，以及明清时期学者续编的用意融入自己编纂的《近思录》相关文献之中。

朱、吕在寒泉精舍编辑《近思录》的旨趣，是为了初学者容易学习把握北宋周敦颐、程颢、程颐、张载四子书的要义，精选其中“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”的语录编辑而成。自此，在中国历史上有相当数量的学者又针对朱熹著述编辑了入门读本，如蔡模《近思续录》、邱濬《朱子学的》、高攀龙《朱子节要》等。该思想、行为也很快影响到朝鲜半岛的学术界，在李朝的学者中，不乏共鸣之音，如韩梦麟在编辑《续近思录》时，认为“朱夫子性理道学上说话，不啻倍蓰于周、程、张诸贤之书信，所谓义理之府库，学门之表准，其一言一语，无非可读可法，而第其篇秩浩穰，若无畔岸，学者不能遍观而尽识”。于是，他从集萃朱子语录的《学的》、《节要》中“采其尤切于学者六七百言，又于四书注疏中取其紧要者数百条，编为一书，而一依《近思录》条目为次，号曰《续近思录》”^④。可见，此书编纂既取法于朱熹当初编集四子语录的初衷，又能效法宋、明学者续编《近思录》之法，从朱熹宏富的著述中采辑语录进行编纂。

并且，李朝学者在抄录传入的中国《近思录》系列文献时，往往对其内容、版式也完全照搬。例如，首尔大学奎章阁藏有清施璜《五子近思录发明》李朝肃宗三十一年（1705）抄本，此抄本源自清康熙年间世荣堂刻本，抄写版式为半叶九行二十字，注文小字双行二十字。左右双边，上白口，下粗黑口，单鱼尾。卷端题“新安施璜虹玉甫纂注，同里吴日慎徽仲甫、汪鉴晦叔甫阅正”。经与中

①（朝鲜）洪启禧《广州府刊〈小学〉〈近思录〉跋》，载于朱熹、吕祖谦辑《近思录》，李朝英祖二十九年木刻本。

②（朝鲜）尹箕《近思录》跋文，载于朱熹、吕祖谦辑，叶采集解《近思录》，李朝宣祖十一年礼山县刊本。

③束景南《序》，载于程水龙《〈近思录〉版本与传播研究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8年。

④（朝鲜）韩梦麟《续近思录》序文，载于韩梦麟编《续近思录》，李朝纯祖十九年木活字本。

国国内所藏世荣堂刊本比较,发现二者如出一辙,甚至连卷首牌记也照样仿录:上横行抄作“孝感熊先生鉴定”,下三竖行抄作“新安施璜虹玉著/五子性理发明/世荣堂藏版”。

3.李朝崇尚理学的君臣、学者,利用活字印刷,多渠道将传入的《近思录》及其注本进行受容改造、更新传布,形成具有本邦民族特色的朱子学读本。相较于中国原文献,这些版本尽管形态发生了变化,而其内容却与原书一致。

中国《近思录》系列文献,国内现存版本多为刻本,活字本极少,然而当其流布朝鲜半岛后,李朝利用自身具备的刻印条件与印制技术,刊印传播了大量各具特色的版本。例如,李朝前期利用活字技术印制《近思录》和叶采《近思录集解》,现存有甲寅字、戊申字、壬辰字、丁酉字、丙辰字本等多种多部,可谓缤纷多姿。

活字印书是朝鲜本的一大特色,据与《近思录》相关的现存文献记载,明永乐元年(1403),李朝太宗告诫群臣说:“吾东方在海外,中国之书罕至,板刻之本易以剜缺,且难尽刊天下之书也。予欲范铜为字,随所得书必就而印之,以广其传,诚为无穷之利。”随后数月之间,铸字多至数十万字。^①明永乐十八年(1420)李朝世宗“命工曹参判臣李藏新铸字样,极为精致。……印者便之,而一日所印多至二十馀纸矣。……由是而无书不印,无人不学,文教之兴当日进,而世道之隆当益盛矣。”^②这些铜活字相较于木板本而言,印制便捷,可反复使用,可见李朝君臣有意铸造活字以印制中国典籍,对书籍广泛流布发挥了积极的作用。到明宣德九年(1434)时,李朝世宗又命李藏等人“更用大字本重铸”,“所铸至二十有馀万字,……一日所印可至四十馀纸,字体之明正,功课之易就,比旧为倍矣。恭惟我殿下圣学无厌,万机之暇,潜心载籍,思欲便于用,广布于下,俾人人皆得以讲明焉。凡再变而铸字之文,尤为尽美”^③。经过几十年不懈努力,李朝铜活字越铸越精,到正统年间李朝铸字所大量印制了《小学》、《近思录》等书,“俾人人读《小学》书以正其操履,读《近思录》以识其门庭而不迷于所从”^④。

由于当时中国流布到朝鲜的《近思录》相关文献数量有限,而崇尚理学的李朝臣民需求量较大,君王对《近思录》之类的朱子学著述广布之意甚浓,于是李朝多次大规模铸造活字,以致铜活字印本大量面世,有力地促进了书籍传播。如叶采《近思录集解》,韩国高丽大学藏有甲寅字本、丙辰字本,首尔大学奎章阁藏有壬辰字本,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有丁酉字本、戊申字本。

①[朝鲜]权近《近思录》跋文,载于朱熹、吕祖谦辑,叶采集解《近思录》,李朝世宗十八年刻本。

②[朝鲜]卞季良《近思录》跋文,载于叶采集解《近思录》,李朝世宗十八年刻本。

③[朝鲜]金篔《近思录》跋文,载于叶采集解《近思录》,李朝世宗十八年刻本。

④[朝鲜]金汶《近思录》跋文,载于叶采集解《近思录》,李朝世宗十八年刻本。

从现存李朝《近思录》相关文献的编纂者、制作者的立意看,他们非常尊崇程朱之学,认为四书之后,在“能垂教于世的儒学读本”中,没有谁能超过《近思录》,因为此书“以道体为核心,以穷理为精髓,以居敬、明诚为存养工夫,以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为实质,以成圣为目标”^①,有助于入道,可为“圣学之阶梯”。所以李朝改造、新生的《近思录》系列文献,内容以弘扬程朱理学思想为主体,在接受宋明理学家思想著述的同时,逐渐加强对本邦朱子学家学术思想的凝练与传扬。

二、李朝《近思录》系列文献的编纂理念

《近思录》及其相关文本的内容,具有学术意义和文献价值,又有阶可寻,对求学者有很好的导引作用。当这些文献流布朝鲜半岛之后,历史上的李朝在整理新编、解说这些文献时,一律遵从朱、吕编纂《近思录》时所采用的取材标准、编纂方法、纲目设定、体系建构等,形成了大量仿编《近思录》文献,其编纂理念受容了相当丰富的中国元素。

首先,在语录的选取上,李朝编纂者接受了朱、吕做法,因地制宜。

面对困博无涯的前人著述,如何编纂一个经典入门读本供后学使用,这是历代学者都很关注的问题。程、朱治学,强调精思体认,程颐指导门人时,主张“自思”、“类聚观之”,然后“自得”。如何贯彻该主张,受二程思想影响的朱、吕二人编纂初衷,是想为那些僻居穷乡而不能遍观四子之书的读书人,提供一部能准确、全面、系统概括四子思想,且又切近日用、便宜遵行的理学入门读本,于是精选四子语录 622 条编辑此书。因此,《近思录》的编纂出发点、路径深深影响南宋及后世的中国学者,仿效《近思录》辑成的续编、仿编本层出不穷。

《近思录》一直受李朝学术界、思想界、教育界的关注,其编纂思路自然会得到效仿。如李朝的李汉膺仰慕中国理学家以及本邦朱子学代表者李滉,他有感于这些性理学家的著述“浩博,茫不知下手”,于是编辑南宋东南三贤朱熹、张栻、吕祖谦,以及李朝李滉的语录共计 1062 条,“篇目一依《近思录》例”,编成《续近思录》十四卷。在李汉膺自己看来,此续编“又为《近思录》之阶梯,而以及四子、六经,退翁所谓‘溯伊洛而达洙泗,无往而不可’者是矣”^②。

《近思录》文献流布到朝鲜半岛后,在当地读者心中生根开花结果的主要表现之一,就是以中国传入的《近思录》为基础,采用相同或相近的选材、编集理念,在中国原有血液之中容和本邦儒学家或朱子学者的“新鲜血液”,衍生出具有本土特色的读本。由于其中的仿编本更多的是选录本土学者著述语录,内容切合当时当地之需,乡土味更浓。

^①张立文:《宋明理学研究》,人民出版社,2002年,第13-14页。

^②[朝鲜]李汉膺《续近思录》序文,载于李汉膺编《续近思录》,李朝时期木刻本。

又如李朝学者朴泰辅选录朝鲜半岛历史上的儒学者言语行事文字，依照《近思录》门类汇分抄录，意欲纂成李朝儒学经典读本，在朴氏去世后，其门人继承其“遗志，循考亭之旧规，依样编辑”《海东七子近思录》十四卷^①。该书是朴泰辅及其门人先后辑录李朝前期朱子学家金宏弼、郑汝昌、赵光祖、李彦迪、李滉、李珥、成浑七位的语录。又因为他们在朝鲜儒学家行列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，故尊奉为“七子”。这种将本邦理学家标定为“子”的做法，肯定和褒奖了七子作为一个整体在儒学史上的影响，也是朝鲜理学成熟的标志之一。

其次，《近思录》“类编”且有“科级”的编排体例，成为李朝学者效仿的经典范式，续编、仿编者皆以之为准绳。

朱、吕在《近思录》编纂体例上进行了开拓实践，《宋史》卷二百五《艺文志》说“《近思录》十四卷，朱熹、吕祖谦编类周敦颐、程颐、程颢、张载等书”。这种“编类”做法得到后世充分肯定，影响深远。正如陈荣捷在《朱子之〈近思录〉》中所言，《近思录》诞生之后，“朱子讲友刘子澄即编《近思续录》，至明而有高攀龙之《朱子节要》，至清而有张伯行之《续近思录》与《广近思录》等……皆依朱子之《近思录》分十四目。《近思录》之内容形式竟支配哲学选录之风气达七八百年。”^②

并且，分类编集的十四卷内容之间具有“科级”，正如编者之一的吕祖谦所说，“循是而进，自卑升高，自近及远，庶几不失纂集之旨”^③。这种类编的理念，利于读者“近思”自学，获得一个从易到难、由低到高的进学次第。因而，后世《近思录》续编、仿编本，都是分作十四卷编辑理学家语录，如现存南宋蔡模《近思别录》十四卷，清代刘源录《续近思录》十四卷、吕永辉《国朝近思录》十四卷等。

历史上李朝的《近思录》相关文献与中国相比，最具特色者就是效仿《近思录》编纂分类体例，兼而容和本邦朱子学家的著述，编纂了一系列仿编文本，如李汉膺编《续近思录》十四卷，韩梦麟编《续近思录》十四卷，宋秉璇编《近思续录》十四卷等。仿编者韩梦麟则肯定朱、吕所编“条分类别，合为十四篇，名之曰《近思录》，使初学之士领其要而得其门焉，其惠后学深矣”^④。

且更具仿效特色的是，在所编《近思录》文献篇名上也流露出深厚的中国情结。中国南宋元明清各朝尊奉周敦颐、张载、程颢、程颐、朱熹等为“子”，并在反映程朱思想的理学书籍命名上，往往用“某子”或“四子”、“五子”等来标定国人所敬仰的学者地位，如明代高攀龙、清代汪佑、王鼎等学者分别编有《朱子节要》、《五子近思录》、《朱子原订近思录》。李朝也照

① [朝鲜]丰城后学：《海东七子近思录序》，载于（朝鲜）朴泰辅编《海东七子近思录》，李朝肃宗年间写本。

② 陈荣捷：《朱学论集》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7年，第79页。

③ 吕祖谦：《近思录后引》。见朱熹、吕祖谦辑，叶采集解《近思录》，元刻本卷首。

④ [朝鲜]韩梦麟《续近思录》序文，载于韩梦麟编《续近思录》，李朝纯祖十九年木活字本。

搬此法,在编集本邦儒学大家或朱子学名家的语录时,其文本名称也以“某子”予以称谓。如:李度中《李子近思录义例》云:“昔汪星溪佑编辑晦翁遗文,名曰‘朱子近思录’,使其子鉴校正。度中窃依星溪事,汇编《栗谷全书》,亦名为‘李子近思录’,使子垂恭校,欲以此为寿道之一脉云尔。”由此可知,其《李子近思录》十四卷完全是仿照清初汪佑《五子近思录》而编,意在凸显李珥之名,传扬朝鲜儒学。正如该书序文所云:“朱子后孔子,栗谷后朱子。此万世不易之言也。栗谷先生亚于生知,浑然天成,纒前烈之遗绪,迹三代之绝轨”。于是,李度中“远仿二程之书,近稽宋子之例,拟称《李子全书》,以致尊尚之义”,“依汪氏编朱子近思事汇辑《全书》要语为十四编,冠之以李子之号”。^①正因为李珥在朝鲜时代的地位如同朱熹在宋以后的地位,故尊奉为“子”,用“李子”题做书名,也顺理成章。

因此,从文献编纂的角度看,中国理学家所编冠名“朱子”、“五子”之类的仿编本,继《近思录》之后在李朝也产生了较大影响。这些书的内容辑录了中国理学家代表周敦颐、程颢、程颐、张载、朱熹等“子”的语录,李朝的朴泰辅、李度中等受其启发,在自己仿编本书名上冠以“七子”、“李子”等称谓,如此命名的方式,凸显出李朝后期社会对本邦朱子学名家学术地位的肯定,也可察以研究朱子学为中心的性理学派在李朝具有的影响力。

最后,李朝《近思录》文献的纲目设定,体系建构,受容了《近思录》的范式。

《近思录》将北宋四子精要之语分类编集为十四卷,原本各卷虽未标出纲目,但朱熹在回答门人提问时,说“《近思录》逐篇纲目:(一)道体,(二)为学大要,(三)格物穷理,(四)存养,(五)改过迁善、克己复礼,(六)齐家之道,(七)出处进退辞受之义,(八)治国平天下之道,(九)制度,(十)君子处事之方,(十一)教学之道,(十二)改过及人心疵病,(十三)异端之学,(十四)圣贤气象。”^②可见朱熹心中是有一个清晰纲目的,且在淳熙二年编集《近思录》的序文中尝曰:“凡学者所以求端用力,处己治人之要,与夫所以辨异端、观圣贤之大略,皆粗见其梗概。”

当代朱子学研究者认为,朱、吕在《近思录》一书中建立了“一个比较完整、独具特色的理学体系”^③,各卷纲目的设定有严密的逻辑关系,这在束景南先生《朱子大传》^④有较详尽论述。如今我们追索历史不难发现,早在南宋时期,朱熹再传弟子及后学(如叶采、杨伯岳)还为此书补拟了十四卷纲目,使该书体系更为明晰。后世文本绝大多数依从于叶采《近思录集解》各卷标题^⑤:道体、为

①[朝鲜]李度中《李子近思录序》,载于李度中编,李垂校《李子近思录》,朝鲜写本。

②黎靖德编,王星贤点校:《朱子语类》卷一〇五,中华书局,1986年,第2629页。

③姜锡东:《〈近思录〉研究》,人民出版社,2010年,第439页。

④束景南:《朱子大传》,商务印书馆,2003年,第351页。

⑤此标题依据明代前期刻本叶采《近思录集解》,现藏中国科学院图书馆。

学、致知、存养、克己、家道、出处、治体、治法、政事、教人、警戒、异端、圣贤。

《近思录》所建构的十四卷体例，成为中外学者编辑理学读本的典型模式，高丽后期、李朝时期的学者在进行相关文献再建时，主观上都很想体现出本土学术思想，或只收本邦人著述的语录，但在編集用意、体系架构上却不会僭越《近思录》的体例，有着浓浓的尊崇意识，均分作十四卷，各卷沿袭朱熹所拟纲目或叶采集解时的标目，或仿拟出文字相近的篇目。如：李朝郑晔、宋时烈《近思录释疑》十四卷，各卷标题为：论道体、总论为学大要止尊德性矣必道问学、论致知、论存养、论克己、论家道、论出处义利、论治体、论治法、论政事、论教学、论警戒、辨异端、观圣贤；李汉膺《续近思录》十四卷，各卷标题是：道体、为学、致知、存养、力行、家道、出处、治道、治法、临政处事、教人之道、警戒、辨别异端、总论圣贤；李度中《李子近思录》十四卷，标题分别是：道体、为学、致知、存养、力行克治、家道、出处、治道、治法、临政处事、教人之道、警戒改过、辨别异端、总论圣贤。

程朱理学对东亚的影响深入而长久，作为其思想载体的《近思录》，体现出其思想体系的严整性，具体则反映在体例结构上，李朝学者在注解、仿编《近思录》时，于此接受最为显著。他们所辑此类文献，其“发凡立例，一遵寒泉之成规”，且认为自己的续编可为“四子、《近思》之羽翼”。尽管这种本土化文本建设没有脱离《近思录》的编纂精神，但他们在更新转载媒介的同时，又在文本内容辑取上融入了本邦朱子学精华。这便有力地助推了程朱之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。

三、李朝《近思录》系列文献的本土化建设

叶采，南宋后期福建人，为朱熹再传弟子，久受朱熹弟子熏陶，颇具睿智远见，南宋淳祐八年（1248）集解《近思录》，淳祐十二年奉书表奏于朝，获得赵宋皇家重视和赞许。自南宋至清末，叶采《近思录集解》系列^①的传本国内现存多达三十来种，这是《近思录》其它注释本难以企及的。故清初邵仁泓认为，《近思录》“原本之美备，实足以该四子之精微，而叶注之详明，又足以阐《近思》之实理”^②。清人陈弘谋评价说：“叶氏用力于此书最专且久，所著《集解》原本朱子旧注，参之诸儒辩论而附以己说，明且备矣”^③。因此，历史上叶采《近思录集解》也成为最受朝鲜半岛欢迎的注本，或直接翻刻，或活字印制，但是他们在吸收叶采注本主体内容的同时，却有与中国因尊朱而推崇叶注不同的一面，即敢于质疑和批驳，展示了自己的理解与主张。

①叶采《近思录集解》系列版本，主要包括重刻本、周公恕类次本、吴勉学校订本等。详见笔者论文《宋叶采〈近思录集解〉版本源流考》。

②邵仁泓：《近思录后跋》，载于叶采《近思录集解》，清康熙年间邵仁泓重订本。

③陈弘谋：重刊《近思录集解》序，载于叶采《近思录集解》，清乾隆元年陈氏培远堂刊本。

1. 李朝前期对叶采《集解》多直接再版并传播。

从韩国现存《近思录》系列文献考察,李朝的《近思录》相关文献,除历史上直接从中国输入外,大多数则是直接翻刻来自中国的文本。由于他们特别崇信朱子再传弟子叶采的《近思录集解》,欲广为流布,故再造叶采《集解》版本最多,明清时期的中国学者注本、仿编本次之。现存韩国的叶采《集解》系列版本有27种,约占现存韩国《近思录》系列文献的33%。它们往往以多种形态的版本面世,木版本、活字本、写本、影印本均有。诸如前文所述《集解》铜活字本,其内容与汉籍原本基本相同,甚至连版式编排也完全相同。事实上,活字印刷是李朝再传叶采注本时所拥有的优势,但同样也注重木板本的传播作用,其代表有:

叶采《集解》李朝世宗十八年(1436)木板本。卷首有叶采《进近思录表》、叶采《近思录集解序》、《集解目录》、《近思录》(此书所取材的14种书名、朱熹序、吕祖谦跋),正文内容也与国内所藏明代刻本一致,只是卷十四末增刻了永乐年间权近跋文、永乐二十年(1422)卞季良跋文、宣德九年(1434)金宾跋文,正统元年(1436)金汶跋文。

李朝中宗十四年(1519)凤城精舍刊本。卷首刻有叶采《近思录集解序》、《集解目录》、《近思录》(即14种书名、朱熹序、吕祖谦跋)、叶采《进近思录表》,正文也与中国存世明代刻本一致,几乎看不出异域特色,因为仅卷十四末有刊记:“正德己卯夏凤城精舍刊”,说明它是李朝刻本。

李朝明宗二十一年(1566)清凉书院刊。其内容体例与国内所藏明代刻本叶采《集解》一致。仅卷十四末有牌记:“嘉靖丙寅(1566)郡守安瑞刊庄中和清凉书院”。

另有李朝文川郡、礼山县、估毕书院、成川府刊本等。这些版本与国内现存同时期的刻本基本相同,原版书的序跋、奏表等依旧保留不变,偶尔新增刊记、题识。

2. 李朝中后期出现对叶采《集解》的质疑、批驳,由此新增一些有创见的性理学读本。

尽管李朝有学者认为叶采“出于朱子,……采为《集解》,而并收吕成公及张南轩、黄勉斋、蔡节斋、李果斋之说,而献于朝,广诸海内”^①,且现存文献确实佐证了叶采《集解》传本数量远超《近思录》原本。但是李朝在接受此类注本时,并非无原则的苟同。从其注释本、仿编本可见,他们受中国政治思想、学术传统的束缚有限,在承传中国历代注家诠释思想的同时,又敢于批判接受,增附己见,透露出一种民族自醒意识。所以即便是对“世诵习久”的叶采《集解》,也敢于不满。如李朝朴履坤认为《近思录》“叶氏之解尚有不能详明者”,

^①[韩]卢相稷:《近思录释义序》,载于[朝鲜]朴履坤著《近思录释义》,韩国石印本,日本昭和八年印刷。

于是“用力于是书，复搜宋儒之论，参订东贤之语，随得随札”^①，撰成《近思录释义》十四卷。该书对《近思录》622条语录中的“十之七八”作了注释，既引用中国的程子、朱子、黄勉斋、真西山、饶双峰、陈潜室等先贤语录，又参照本邦李滉、李珣、金长生等名贤的语录进行解说，对叶采集解提出异议，阐发己见。“所引所按，井井有据，足以资益于读者”。如《近思录》卷三第49条，叶采集解云：“‘沿流而求源’，谓因言以求其意也。”朴履坤却认为：“叶注谓因言求意，愚则以为因《传》而求《易》也。”卷十四第17条，朴履坤又云：“‘教人而人易从’，注（笔者按，即叶采集解）：‘教人各因其资’。按，注说恐非。诚在言前，故人自化而易从也，且非但指学者。”

面对李朝中期的学风，实学派代表李瀾主张对儒学经典不要盲从，要有创造性的理解和发挥，说：“以今观之，儒学日屈，无所事事，谓诸子之书不可卒，既不欲致思于其间，虽欲志焉，浩浩莽莽，亦远而无得也。要其专意四子，不得不措，非此书不可信乎！”他在授家塾子弟时，担忧子弟不能见到《近思录》“意趣”，“辄加笺解，俾有以易入云尔”^②。于是，编成《星湖先生近思录疾书》十四卷。此书侧重于对宋代四子语录评析、总结，或对朱子、叶采集解进行质疑，并阐述己见。如《近思录》卷二第6条，李瀾曰：“朱子曰：‘明道说得来洞洞流转，若伊川以笃志解立其诚，则缓了，此说亦不可易矣。’今叶注引朱子语云：‘择言谓修辞，笃志谓立诚。立诚即上文忠信。’此条遍求不得，而与见于《语类》者分明不合，则舍之无疑。此因《易大传》中有，朱子释伊川意者，不察下有结辞，遂拈出为说也，似甚鲁莽。”

南宋叶采《集解》为朱子学脉之嫡传，在朝鲜人的心目中，其内容很适用于教导求学问道者，为程朱理学在李朝的发展壮大奠定了一块基石。然而，李朝的学者在注解、传播《近思录》时，对其相关注文又敢于质疑或甚至批驳，从中可察朝鲜儒者民族主体意识的觉醒，以致酝酿出李朝中后期对于居统治地位数百年的朱子学的不满。

四、余论

历史上的朝鲜半岛，在思想文化方面有着深厚的中国渊源。宋代儒学的主流派“程朱理学”，对他们也产生了异常深远的影响。《近思录》自南宋后期传至朝鲜半岛，朱熹的“阶梯”之说、《近思录》的“人道”价值，便得到了高丽学者的肯定，随后对李氏朝鲜政治思想、学术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，李朝在接受中国《近思录》及其相关文献时不仅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征，而且以之为基础于李朝前期新生出大量朱子学的生命体态，大大推动了朝鲜理学的发展。

①[韩]卢相稷：《近思录释义序》，载于《近思录释义》，韩国石印本。

②[朝鲜]李瀾：《星湖先生近思录疾书》，载于李瀾编《星湖先生近思录疾书》，李朝时期写本。

流布朝鲜半岛的《近思录》系列文献,代表的是一种外来思想文化,而且是先进、发达、文明程度较高的文化,“当外来文化有利于原有的文化模式的维护时,便容易接受,并被作为一种新的营养补充到文化机体之中”^①,因此,李朝前期的儒学名家金宏弼、郑汝昌、赵光祖、李彦迪、李滉、李珥、金长生等,都能主动接受并加以传播,其新创的《近思录》相关文献又体现出本邦民族特色。可以说,李朝政治、思想、学术界的主动接受,成为这种盛传景况的关键。

在文献编纂理念方面,《近思录》编纂方法容易操作,结构体例便于取法。于是,李朝《近思录》的相关文献沿袭了《近思录》纲目结构,发凡立例,如出一辙。诸如李朝的多种《续近思录》文本,体例结构完全接受《近思录》所代表的理学体系,而内容多为本邦学者之论说文字,即用中国的瓶装朝鲜的酒,溶合了本族朱子学者思想、本土文化教育、图书印刷等多样元素,最终建构出适合本民族诵习的文本。所以,金长生在校阅郑晔《近思录释疑》时说,“此吾友守梦公(笔者按,郑晔)之所编也,读《近思》者不可以无此也”^②,因而嘱咐宋时烈加以校刊,故有李朝显宗二年木板本《近思录释疑》十四卷,随后有活字、抄写等多种版本形态面世。

李朝在受容中国《近思录》文献时,在新创文本内容上体现出一种兼容并蓄思想,既将中国宋元明清具有代表性的理学家语录收入其中,又能兼顾本邦名家语录,诸如李滉、李珥等朱子学大家。也正是因为以“讲明朱子之学,以斯道为己任”的李滉等学者影响下,李朝社会倡行“绍修洛闽《近思》之学”^③,故在李朝前期形成了朝鲜朱子学的兴盛局面,所创建的以本民族朱子学家思想内容为主体的《近思录》系列文献,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时代思潮、社会之需。例如《近思录注解丛编》中收录的朝鲜学者解说本有:李滉《近思录问目》、李珥《近思录口诀》、金长生《近思录释疑》、林泳《近思录读书札记》、郑重器《对近思录策》、李瀾《近思录疾书》、赵承洙《近思录问答》、南景义《近思录讲义》、柳重教《近思录讲义发问》、林翰周《近思录叶注存疑》等。他们较多地展现出本民族学者关于《近思录》内容的别样诠释。因而,李朝学者的《近思录》系列文献,相对于《近思录》文化母体,逐渐实现了在异国他乡传播而产生的一种文化增值;朝鲜民族的主体意识,隐约之中也由面对宗主的自卑走向一种民族自尊。

【作者简介】曹洁,女,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。研究方向:古汉语研究。程水龙,男,温州大学瓯江特聘教授。研究方向:古文献学研究。

①沙莲香等主编:《传播学》,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1990年,第72页。

②[朝鲜]宋时烈:《近思录释疑后序》,载于[朝鲜]郑晔著,宋时烈等校《近思录释疑》,李朝显宗二年刻本。

③[朝鲜]李汉膺《续近思录》序文,载于李汉膺编《续近思录》,李朝时期刻本。